

收稿日期:2024-12-05

大龄农民工社会保障满意度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CSS2021数据的分析

王艳¹, 刘春朋²

(1. 盐城师范学院 商学院, 江苏 盐城 224007; 2. 盐城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盐城 224007)

摘要: 农民工群体中大龄农民工的比重逐年上升, 立足个体因素、家庭因素、社会生活因素和社会保险因素四个层面, 采用实证分析法系统探讨大龄农民工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就业保障、最低生活保障、住房保障及总体社会保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 家庭经济状况、休闲娱乐活动和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社会保障满意度的核心变量, 其次是家庭收支状况、家庭关系和社交生活, 再次为医疗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养老保险及工伤保险的参与情况。此外, 大龄农民工受教育程度越高, 社会保障满意度越低。在逐步回归分析中, 影响总体社会保障满意度的各分项满意度权重从高到低依次为住房保障、养老保障、就业保障、医疗保障和最低生活保障。整体来看, 大龄农民工的总体社会保障满意度高于各单项保障满意度, 其中就业保障满意度最低, 是亟需关注的政策重点。

关键词: 大龄农民工; 养老保障; 医疗保障; 就业保障

中图分类号: F32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873(2025)02-0034-12

作者简介: 王艳(1991—), 女, 四川万源人, 盐城师范学院商学院讲师, 博士, 主要从事公共心理研究; 刘春朋(1990—), 男, 山东临沂人, 盐城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博士, 主要从事社会关系研究。

DOI: 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25.02.016

一、引言

随着中国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速, 农民工群体在基础设施建设、制造业和服务业等领域对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 随着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变化, 农民工群体中大龄农民工(通常指50岁及以上的群体)比例逐年上升。《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显示, 2023年全国农民工总数达29753万人, 其中大龄农民工的比例已从2014年的17.1%增加至2023年的30.6%^[1], 已超过大龄劳动力(年龄大于50岁者)在总劳动力中29.6%的占比^[2]。大龄农民工的比重逐年上升, 不仅改变了劳动力市场的构成, 也深刻影响了社会保障体系对该群体需求的响应和适应^[3]。

与社会总体人群相比, 大龄农民工在养老、医疗、就业等社会保障领域的覆盖率和待遇水平普遍较低^[4]。近年来政府虽已出台一系列旨在扩大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范围、促进城乡医疗保障

一体化、提高工伤保险普及率等政策措施,但这些政策仍未能有效缩小农民工与城镇居民之间的显著差距。尽管如此,许多农民工被城市劳动力市场认定为“大龄”之后,依然坚守在城市劳动力市场,并沿着劳动力市场层级逐渐下沉却又持续抗拒回归农业劳动^[4]。然而,大龄农民工由于年龄较大、劳动技能相对较低、健康状况较差等因素,面临着更大的就业稳定性和收入平等性挑战,这使得他们对社会保障的依赖性更强,并对保障的公平性和可获得性有了更高的期待^[5]。

现有研究表明,影响农民工社会保障满意度的因素多种多样,主要包括社会保障的参与状况、家庭支持情况、健康状况、社会地位感受以及公平感等^[6]。此外,个体的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政策的知晓度、保障内容的全面性、就业稳定性以及地方政策差异等,也是影响社会保障满意度的重要因素^[7]。然而,现有研究大多集中于农民工整个群体的社会保障满意度,对大龄农民工群体的特殊需求及其在不同社会保障项目中的具体满意度差异的探讨相对有限。

本研究将重点关注大龄农民工群体,采用实证分析法系统探讨影响其社会保障满意度的关键因素。具体而言,本研究旨在分析大龄农民工在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就业保险等核心社会保险项目中的参保现状,识别个人因素、家庭因素、社会生活以及社会保险等多维因素对大龄农民工社会保障满意度的影响,评估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就业保障、住房保障和最低生活保障满意度对大龄农民工总体社会保障满意度的影响。通过这些分析,本研究将为优化现有社会保障政策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和实践建议,并为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做出相应贡献。

二、研究框架和思路

(一) 研究框架

如图 1 所示,本研究从个体因素、家庭因素、社会生活因素和社会保险因素四个层面出发,识别影响大龄农民工社会保障满意度的关键因素。具体而言,个体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和工作状况五个变量,家庭因素涵盖家庭收支、家庭关系和家庭经济三个变量,社会生活因素包括社会经济地位、休闲娱乐活动和社交生活三个变量,社会保险因素则涉及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六个变量。此外,为了深入剖析大龄农民工在各个社会保障项目中的满意度,本研究将社会保障满意度划分为六个维度:养老保障满意度、医疗保障满意度、就业保障满意度、最低生活保障满意度、住房保障满意度和总体社会保障满意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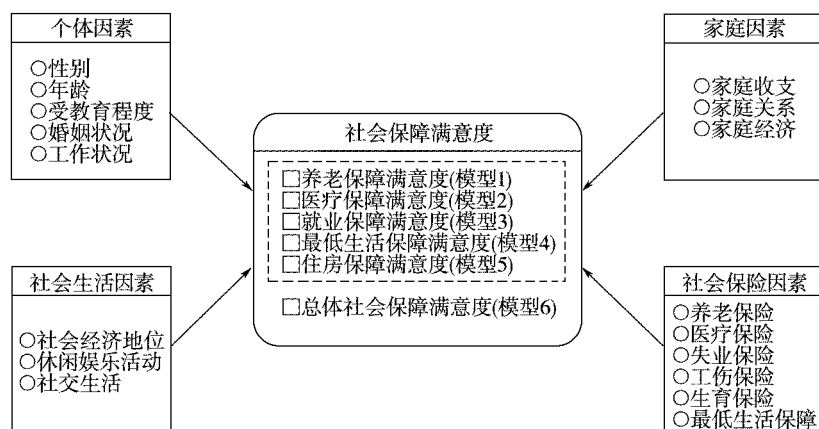


图 1 研究框架

(二)研究思路

本研究的分析思路包括数据筛选、描述性统计、多元回归分析和逐步回归分析四个主要步骤。首先,使用 SPSS 27 软件对 2021 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CSS2021)数据进行筛选,并作描述性统计分析,全面了解样本数据的基本特征和分布情况。其次,基于理论框架,构建六个回归模型,将养老保障满意度、医疗保障满意度、就业保障满意度、最低生活保障满意度、住房保障满意度和总体社会保障满意度作为因变量,个体因素、家庭因素、社会生活因素和社会保险因素作为自变量,分别进行多元回归分析。通过检验模型 1 至模型 6,识别各个维度中的关键影响因素,并探讨其对大龄农民工社会保障满意度的作用机制。最后,以总体社会保障满意度为因变量,以养老保障满意度、医疗保障满意度、就业保障满意度、最低生活保障满意度和住房保障满意度为自变量,采用逐步回归法探索各单项社会保障满意度对总体社会保障满意度的影响程度。

三、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源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官方网站 2023 年 1 月发布的最新调查数据,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于 2021 年开展的全国概率抽样入户调查数据。为了确保研究对象的代表性和针对性,本研究将年龄为 50 岁及以上、户籍类型为农业户口且曾从事或目前从事非农工作的个体定义为大龄农民工群体,为分析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持和明确的研究范围。

(二)变量选取与定义

1. 被解释变量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大龄农民工社会保障满意度,包括养老保障满意度、医疗保障满意度、就业保障满意度、最低生活保障满意度、住房保障满意度以及总体社会保障满意度。这些内容来源于 CSS2021 问卷的“E 部分:社会保障”,具体为 E5 问题:“请用 1—10 分来评价您对政府向老百姓提供的下列社会保障状况的满意度(包括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就业保障、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政府提供的经济适用房/公租房/廉价房等基本住房保障,以及总体社会保障状况),1 分表示非常不满意,10 分表示非常满意”。

2. 解释变量

本研究的解释变量分为个体因素、家庭因素、社会生活因素及社会保险因素四个方面。

(1)个体因素的变量

个体因素的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和工作状况,变量采用 CSS2021 问卷中的相关定义。性别:男性赋值为 1,女性赋值为 2。年龄:2021 减去出生年份所得的连续变量。婚姻状况:初婚有配偶、再婚有配偶及同居者均定义为“有配偶”,赋值为 1;未婚、离婚及丧偶者定义为“无配偶”,赋值为 0。受教育程度:未上学赋值为 1,小学赋值为 2,初中赋值为 3,高中赋值为 4,中专、职高、技校、大学专科及本科以上合并为“中专及以上”,赋值为 5。工作状况:有工作或目前处于在职休假、在职学习、临时停工歇业状态的受访者均定义为“有工作”,赋值为 1;没有工作的受访者赋值为 0。

(2)家庭因素的变量

家庭因素的解释变量包括家庭收支、家庭关系和家庭经济,变量采用 CSS2021 问卷中的相关定义。家庭收支:2020 年家庭总收入小于支出赋值为 1,收支相抵赋值为 2,收大于支赋值为 3。家庭关系和家庭经济:用 1—10 分分别表达对“家庭关系”“家庭经济状况”的满意程度,得分越高表示满意程度越高。

(3) 社会生活因素的变量

社会生活相关的变量包括社会经济地位、休闲娱乐活动和社交生活,变量采用 CSS2021 问卷中的相关定义。社会经济地位:认为目前本人社会经济地位在本地大体属于下层赋值为 1,中下层赋值为 2,中层赋值为 3,中上层赋值为 4,上层赋值为 5。休闲娱乐活动和社交生活:用 1—10 分分别表达对“休闲/娱乐/文化活动”“社交生活”的满意程度,得分越高表示满意程度越高。

(4) 社会保险因素的变量

社会保险因素的变量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变量采用 CSS2021 问卷中的相关定义。养老保险:目前有没有政府提供的养老保险或退休金。医疗保险:目前有没有政府提供的医疗保险或公费医疗。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目前有没有参加下列社会保障(1. 失业保险,2. 工伤保险,3. 生育保险,4. 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对于上述六个社会保险参与变量,回答“有”的受访者赋值为 1,回答“没有”的赋值为 0。

(三) 样本构成与统计分析

本研究从 CSS2021 数据中获取了 757 份有效大龄农民工样本,平均年龄为 58.19 岁。在社会保险方面,34.5% 的样本拥有养老保险,62.7% 拥有医疗保险,3.0% 拥有失业保险,4.4% 拥有工伤保险,2.0% 拥有生育保险,6.2% 享有最低生活保障。在社会保障满意度方面,总体社会保障满意度的均值高于各项子项满意度,且就业保障满意度最低。其他变量(如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工作状况、家庭收支、家庭关系和社会经济地位)的详细统计结果见文末附表。

(四) 实证检验结果

1. 多元回归分析

如表 1 所示,模型 1 至模型 6 分别以养老保障满意度、医疗保障满意度、就业保障满意度、最低生活保障满意度、住房保障满意度和总体社会保障满意度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其中,养老保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包括家庭关系、家庭经济、社会经济地位、休闲娱乐活动和社交生活五个因素(模型 1);医疗保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包括性别、婚姻状况、家庭关系、家庭经济、休闲娱乐活动和医疗保险(模型 2);就业保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有受教育程度、家庭收支、家庭经济、社会经济地位、休闲娱乐活动和社交生活(模型 3);最低保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包括年龄、家庭收支、家庭经济、社会经济地位、休闲娱乐活动、工伤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模型 4);住房保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包括受教育程度、家庭收支、家庭经济、社会经济地位、休闲娱乐活动和医疗保险(模型 5);总体社会保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包括受教育程度、家庭关系、家庭经济、社会经济地位、休闲娱乐活动、社交生活、养老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模型 6)。通过综合模型 1 至模型 6 的分析结果,可以得出家庭经济状况、休闲娱乐活动和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社会保障满意度的关键因素,其次是家庭收支状况、家庭关系和社交生活,而医疗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养老保险及工伤保险的影响则相对较弱。值得注意的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大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满意度较低。

表1 社会保障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类别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养老保障 满意度	医疗保障 满意度	就业保障 满意度	最低生活保障 满意度	住房保障 满意度	总体社会保障 满意度
个体因素	性别	-0.021 (-0.586)	-0.071* (-2.039)	-0.017 (-0.523)	-0.027 (-0.782)	-0.031 (-0.896)	-0.050 (-1.458)
	年龄	-0.018 (-0.462)	-0.032 (-0.855)	0.009 (0.254)	-0.066* (-1.769)	0.015 (0.389)	-0.015 (-0.415)
	受教育程度	-0.058 (-1.615)	-0.008 (-0.222)	-0.066* (-2.004)	-0.020 (-0.592)	-0.058* (-1.678)	-0.067* (-1.942)
	婚姻状况	-0.034 (-1.010)	-0.066* (-2.009)	-0.006 (-0.195)	-0.020 (-0.617)	0.006 (0.171)	-0.024 (-0.756)
	工作状况	-0.014 (-0.392)	-0.033 (-0.973)	0.013 (0.400)	0.000 (0.006)	0.020 (0.578)	-0.014 (-0.427)
家庭因素	家庭收支	-0.008 (-0.233)	0.041 (1.186)	0.073** (2.281)	0.066* (1.958)	0.077** (2.265)	0.013 (0.371)
	家庭关系	0.059* (1.668)	0.062* (1.789)	0.032 (0.989)	-0.005 (-0.154)	0.065 (1.892)	0.088*** (2.600)
	家庭经济	0.188*** (4.613)	0.222*** (5.605)	0.263*** (7.049)	0.256*** (6.566)	0.194*** (4.912)	0.232*** (5.937)
社会生活 因素	社会经济 地位	0.085** (2.384)	0.040 (1.159)	0.121*** (3.693)	0.093** (2.707)	0.064* (1.832)	0.071** (2.070)
	休闲娱乐 活动	0.162*** (3.721)	0.215*** (5.098)	0.233*** (5.855)	0.201*** (4.841)	0.247*** (5.861)	0.169*** (4.063)
	社交生活	0.106** (2.522)	0.064 (1.571)	0.069* (1.786)	0.051 (1.257)	0.033 (0.798)	0.103** (2.560)
社会保险 因素	养老保险	0.054 (1.460)	0.053 (1.460)	0.037 (1.081)	0.025 (0.707)	0.038 (1.049)	0.086** (2.401)
	医疗保险	0.045 (1.316)	0.113*** (3.422)	0.045 (1.467)	0.027 (0.823)	0.068** (2.073)	0.051 (1.557)
	失业保险	-0.046 (-1.008)	-0.012 (-0.271)	-0.048 (-1.146)	-0.055 (-1.243)	-0.056 (-1.248)	-0.052 (-1.185)
	工伤保险	0.043 (1.020)	0.006 (0.154)	0.022 (0.581)	0.071* (1.772)	0.027 (0.653)	0.029 (0.711)
	生育保险	0.042 (0.942)	0.038 (0.887)	0.055 (1.346)	-0.002 (-0.054)	0.014 (0.320)	0.012 (0.291)
	最低 生活保障	0.013 (0.388)	0.019 (0.577)	0.039 (1.261)	0.181*** (5.570)	0.036 (1.096)	0.095*** (2.914)
R ²		19.8%	24.0%	32.7%	26.5%	24.3%	26.2%
观测值		757	757	757	757	757	757

注:***、**、* 分别代表在 1%、5%、10%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 *t* 值。

2. 逐步回归分析

以总体社会保障满意度为因变量,养老保障满意度、医疗保障满意度、就业保障满意度、最低生活保障满意度及住房保障满意度为自变量,采用逐步回归分析进行检验,结果详见表 2。模型 11 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R^2 值为 71.5%,即 71.5%的总体社会保障满意度的变异可通过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就业保障、最低生活保障和住房保障满意度来解释。这一结果表明,提高上述五个保障领域的满意度对于提升总体社会保障满意度具有重要作用。此外,模型 7 至模型 11 的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影响总体社会保障满意度的因素按其影响力大小依次为:住房保障满意度、养老保障满意度、就业保障满意度、医疗保障满意度以及最低生活保障满意度。

表 2 总体社会保障满意度的逐步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模型 10	模型 11
住房保障满意度	0.771*** (33.307)	0.557*** (21.718)	0.466*** (16.274)	0.430*** (14.842)	0.388*** (12.435)
养老保障满意度		0.362*** (14.109)	0.291*** (10.673)	0.223*** (7.500)	0.209*** (7.015)
就业保障满意度			0.194*** (6.480)	0.161*** (5.338)	0.133*** (4.276)
医疗保障满意度				0.157*** (5.181)	0.147*** (4.833)
最低生活保障满意度					0.107*** (3.434)
ΔR^2	59.50%	8.50%	1.70%	1.00%	0.50%
R^2	59.50%	68.00%	69.70%	70.70%	71.50%

注:*** 代表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t 值。

四、研究结论和建议

(一) 研究结论

1. 大龄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与率低

通过描述统计分析发现,大龄农民工在社会保险参与方面存在明显不足。首先,医疗保险的参保比例为 62.7%,尽管这一数据表明大部分大龄农民工能够获得基本医疗保障,但与我国整体医疗保险参保率超过 95% 的水平相比^[8],仍有显著差距。其次,养老保险的参保率仅为 34.5%,远低于全国整体参保率 74.4% 的水平^[9],这一差距突出反映了大龄农民工在退休后面临的经济保障风险。此外,大龄农民工在其他社会保险领域的参与率更为低下,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的参保比例均不足 10%。这一现象可能源于大龄农民工对社会保险政策认知的不足、参保费用的经济负担较重、参保途径受限等多重因素^[10]。考虑到大龄农民工普遍面临收入不稳定和经济压力较大的问题,这种低参保率将导致他们在晚年缺乏必要的经济支持,进而影响其生活质量和社会稳定^[11]。

2. 社会生活是影响社会保障满意度的核心因素

首先,休闲娱乐活动对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就业保障、最低生活保障、住房保障以及总体社

会保障满意度均具有显著影响。这表明,休闲娱乐活动不仅为个体提供了减轻压力和改善心理健康的机会^[12],同时也在提升社会保障满意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参与这些活动,个体能够在精神和情感层面获得支持,从而提升对社会保障制度的认同和满意度。其次,社会经济地位对养老保障、就业保障、最低生活保障、住房保障以及总体社会保障满意度具有显著影响。作为衡量个体经济水平、社会地位及社会资源的重要指标,社会经济地位与个体的社会保障需求和期望密切相关^[13]。通常情况下,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伴随着更强的经济能力和更多的资源获取,有助于提升个体对社会保障的满意度。这种影响使得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人群在社会保障方面的体验存在显著差异。最后,社交生活对养老保障满意度、就业保障满意度以及总体社会保障满意度具有显著影响。社交生活反映了个体与社会互动的广度和深度,直接影响其社会资源的获取和心理支持的建立^[14]。对于大龄农民工而言,良好的社交生活不仅能提供情感支持,还有助于他们获取更多的社会信息和资源,从而增强其对社会保障的认同感和满意度。

3. 家庭在决定社会保障满意度中发挥关键作用

首先,家庭经济状况显著影响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就业保障、最低生活保障、住房保障以及总体社会保障满意度。经济状况较好的家庭能够更好地满足日常生活需求,减轻生活压力,从而能够更加客观和理性地评估社会保障政策的实施效果。相反,经济状况较差的家庭可能因日常生活中的压力而对社会保障的期望值过高或产生不切实际的要求,从而影响其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满意度。其次,家庭收支对就业保障、最低生活保障和住房保障的满意度具有显著影响。家庭收支直接反映了家庭的收入水平和支出压力,决定了家庭的经济状况及其对社会保障制度的依赖程度。收入较低且支出压力较大的家庭,通常对就业保障、最低生活保障和住房保障的需求更为迫切,因此其对社会保障政策的满意度往往与政策的实际执行效果密切相关。最后,家庭关系对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和总体社会保障满意度的影响尤为重要。家庭关系的和谐程度不仅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还决定了个体获得情感支持和社会资本的能力^[15]。良好的家庭关系能够增强个体的心理安全感,提升其对社会保障体系的信任度和参与意愿。相反,家庭关系紧张或缺乏支持的个体,特别是农民工,可能因孤立感增强^[16],对社会保障的有效性产生怀疑,从而降低其满意度。

4. 社会保险对社会保障满意度的影响有限

首先,养老保险仅对总体社会保障满意度产生了显著影响。这表明,尽管养老保险为大龄农民工提供了一定保障,但对其他社会保障维度的影响较为有限。其次,医疗保险仅对医疗保障满意度和住房保障满意度产生了显著影响,反映出医疗保险在改善大龄农民工的健康保障和住房条件方面具有一定作用,但作用范围相对较窄。工伤保险则仅对最低生活保障满意度产生了显著影响,这可能与工伤保险主要针对工伤风险,而其对其他类型保障的影响较少有关。最低生活保障则仅对最低生活保障满意度和总体社会保障满意度产生了显著影响,说明“低保”(最低生活保障)政策虽能直接影响其受益者的基本生活保障,但在其他保障方面的影响较为有限。此外,失业保险对六个维度的社会保障满意度均没有显著影响,这一结果与农民工本身多从事短期、临时性工作,对失业带来的社会保障期待较低有关。概而言之,各项社会保险参与情况对社会保障满意度的影响较为有限,主要体现在其仅对个别维度的社会保障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其主要原因在于大龄农民工的社会保险参与率普遍较低,且现有福利水平未能有效满足这一群体的实际需求^[17]。

5. 五大保障维度对总体社会保障满意度的影响大

根据逐步回归分析结果,住房保障、养老保障、就业保障、医疗保障和最低生活保障的满意度能够解释总体社会保障满意度71.5%的变化,说明这五大保障维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总体社会保障满意度的高低。在这些维度中,住房保障满意度对总体社会保障满意度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养老保障满意度和就业保障满意度,而医疗保障满意度和最低生活保障满意度的影响相对较小。因此,提升整体社会保障满意度的有效途径应优先关注住房、养老和就业保障,尤其是就业保障问题。因为就业保障满意度是所有指标中得分最低的,说明大龄农民工群体面临较大的就业压力,亟需社会保障政策在这一领域的改善和强化。

(二)相关建议

1. 提高大龄农民工社会保险覆盖率

提高大龄农民工的社会保险覆盖率是实现社会公平和保障其基本生活的关键之一^[18]。解决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减轻大龄农民工的缴费负担,确保其顺利参保。为此,政府可通过财政补贴等手段有效降低初期缴费的经济压力。具体而言,政府应根据农民工的年龄、收入水平等因素,制定差异化的补贴政策,特别是对50岁及以上群体,可在首年提供部分或全额补贴,随着时间推移,逐步递减补贴直至正常缴费水平。对于缴费年限不足的农民工,政府可以推出“延长缴费年限优惠政策”,允许其在15年内分期完成缴费,从而有效缓解一次性补缴的经济压力。

在此基础上,简化参保流程是提高社会保险参保率的重要手段。政府应简化参保手续,减少申请材料,尤其是针对首次参保的大龄农民工,自动对接个人信息与缴费记录,减少农民工的手动操作。此外,应建立一站式服务平台,整合各部门的审批流程,方便农民工在线查询和办理相关手续。对于健康状况较差的老年农民工,应设置“绿色通道”服务,确保其能够优先审批并尽早享受社保待遇。

此外,政策宣传的加强对于提高参保意识至关重要。政府可以通过传统媒体如广播、电视等制作简明易懂的宣传材料,确保大龄农民工在日常生活中广泛接触相关信息。同时,可以在工地、集市等人流密集场所开展巡回宣传,并利用网络平台、短视频等新型媒体形式,尤其针对年轻的大龄农民工,制作生动形象的社保普及视频。此外,政府还应与社区服务中心合作,开展免费社保知识培训,帮助农民工更好地理解政策内容,激发其参保的积极性。

激励企业履行社会保险缴纳责任亦是至关重要的一环。政府可通过税收减免政策,允许企业在缴纳社保费用时按比例扣除,减轻其税负。同时,设立专项补贴,鼓励企业为大龄农民工购买社保,特别是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对于积极履行社保缴纳责任的企业,政府可通过授予“企业社会责任优秀奖”或认证证书等形式,树立行业榜样,激励更多企业参与这一公益事业。

2. 扶持大龄农民工再就业

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地位显著影响大龄农民工在六个维度上的社会保障满意度,其中就业保障满意度得分最低。这一现象表明,解决大龄农民工的就业问题迫切需要关注,这不仅能提升其社会保障满意度,还能有效缓解养老保障金不足的问题^[19]。因此,促进大龄农民工再就业不仅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而且对经济的稳定发展也具有积极影响。

首先,消除就业偏见是解决大龄农民工就业问题的关键。政府及社会组织应通过媒体宣传大龄劳动力的优势,例如其丰富的工作经验、负责的工作态度以及较低的离职率,并通过分享成

功的再就业案例,改变社会对这一群体的负面看法。同时,必须加强反歧视法律的执行力度,确保招聘过程中不因年龄差异对劳动者实施不公正待遇,违规企业应受到相应的处罚。

其次,激励企业吸纳大龄农民工是解决其就业问题的另一关键措施。政府可以通过税收减免或社保费用返还等优惠政策,降低企业用工成本,从而鼓励企业雇佣更多的大龄农民工。例如,政府可以对雇佣50岁以上农民工的企业提供1至2年的社保费用返还或税收减免。同时,根据企业雇佣大龄农民工的比例,政府还可设计分级激励措施,推动企业扩大招聘规模。为进一步促进就业,政府应提供岗位适配服务,依据农民工的身体状况、技能和经验,协助企业为其匹配适合的岗位。

再次,提供符合市场需求的技能培训是提升大龄农民工就业能力的重要途径^[20]。政府应定期发布行业人才需求报告,依据市场需求设计精准的培训内容。例如,针对家电维修、健康护理、家政服务等领域的需求,政府可以组织相关技能培训,并为参与培训的农民工提供补贴或奖学金,减轻其经济负担。此外,政府应加强与企业和行业协会的合作,推动培训与就业对接,帮助农民工顺利进入相关领域。

最后,鼓励灵活就业,为大龄农民工提供一种可行的就业方式。政府应支持平台经济的发展,鼓励大龄农民工参与电商、网约车、外卖配送等灵活就业形式。为确保其社会保障权益,政府可出台政策,为注册合法平台的农民工提供社保缴费补贴。地方政府还应建设灵活就业平台,提供岗位信息、匹配服务和法律保障,帮助大龄农民工找到适合的工作。对于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缴费方式,政府可考虑允许其根据实际收入灵活调整缴费金额,以确保大龄农民工在灵活就业过程中能够享有与正式就业相等的社会保障待遇。

3. 助力改善大龄农民工家庭经济

多元回归结果表明,家庭经济和家庭收支是影响大龄农民工社会保障满意度的重要因素。因此,改善大龄农民工家庭的经济状况对于提升其社会保障满意度具有重要意义。以下措施有助于有效促进大龄农民工家庭经济的改善。

首先,增加家庭成员的就业机会是改善家庭经济的基础。特别对于“两代”农民工家庭,政府应推出以家庭为单位的定向培训计划,鼓励年轻劳动力与年长劳动力共同参与培训和创业辅导,以提升家庭整体收入水平^[21]。此外,政府应支持家庭协同创业,提供创业贷款、税收减免、租金补贴等政策,鼓励家庭在小型商业或服务领域开展创业,促使收入来源多样化。政府还应定期评估家庭就业及经济状况,并根据评估结果及时调整政策。例如,针对高就业困难家庭,可优先提供技能培训、职业指导或再就业服务,帮助其克服就业障碍,提升收入水平。

其次,强化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对于改善家庭经济状况至关重要。对于因病或意外导致无法继续劳动的家庭,政府应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并扩大其覆盖范围。政府应定期开展家庭收入与支出调查,依据调查结果动态调整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特别是针对因健康问题或失业导致收入中断的家庭。此外,应设立“救急难”基金,简化申请流程,为遭遇突发困境的家庭提供临时经济援助,帮助其渡过难关。

再次,设立婴幼儿托育专项基金是有效改善大龄农民工家庭经济的途径。低收入农民工家庭常面临较大的育儿负担,政府可通过托育专项基金补贴托育费用,尤其是对低收入、单亲或贫困家庭。根据家庭收入和托育费用,政府应提供一定比例的补贴,并加强与托育机构的合作,扩大服务覆盖面,尤其通过“流动托育”服务(如上门托育、社区托育等)满足农民工家庭的托育需求,从而减轻家庭的经济压力。

最后,完善住房补贴与廉租房政策同样是缓解农民工家庭经济压力的关键措施。政府应扩

大廉租房政策的适用范围,优先考虑低收入农民工家庭。通过提供租房补贴,政府可以有效降低大城市中的租房成本,减轻大龄农民工家庭的房租负担。此外,政府还应提供低利率购房贷款或租房过渡期贷款,帮助农民工改善居住条件。为了满足农民工的住房需求,政府应鼓励企业与地方政府合作开发适合农民工群体的住房产品,从而进一步降低其居住成本,提升生活质量。

五、研究局限

本研究首次针对大龄农民工群体探析个体因素、家庭因素、社会生活因素和社会保险因素对养老保障满意度、医疗保障满意度、就业保障满意度、最低生活保障满意度、住房保障满意度和总体社会保障满意度的影响,识别出家庭经济状况、休闲娱乐活动、社会经济地位、家庭收支状况、家庭关系和社交生活等重要影响因素,同时也发现社会保险参与情况的影响作用极为有限,并将其原因归为参保率低和福利水平不足。尽管取得了重要发现,但仍存在局限性,需要在后续研究中加以改进和完善。首先,本研究基于 CSS2021 横截面数据,虽然该数据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但其静态特性无法反映社会保障满意度随时间变化的动态过程。未来研究可结合多期数据,采用面板数据模型或时间序列分析,探索社会保障满意度的动态变化及其影响机制,从而更全面地评估政策效果。其次,社会保障满意度本质上是一种主观评价,可能受到受访者个人期望、认知偏差以及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难以全面呈现社会保障政策的客观效果。未来可以通过混合研究方法,将定量分析与定性研究相结合,深入挖掘受访者的社会保障体验及满意度形成的具体路径。

参考文献

- [1] 国家统计局. 2023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EB/OL]. (2024-04-30)[2024-08-13]. https://www.stats.gov.cn/xxgk/sjfb/zxfb2020/202404/t20240430_1948783.html.
- [2] 中国就业人口年龄结构解读:35 岁以下哪些行业最集中?[EB/OL]. (2022-09-22)[2024-10-25]. <https://news.cctv.com/2022/09/02/ARTIIEVfgYyL1SkalbRsDOpz220902.shtml>.
- [3] 杨燕绥. 加强大龄农民工就业扶持与养老保障[J]. 人民论坛, 2024(19): 68-71.
- [4] 王欧. 大龄农民工的“下沉式”工作流动[J].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 2024(4): 158-159.
- [5] 魏燕, 胡宝华. 老年农民工社会保障状况调查[J]. 合作经济与科技, 2024(22): 168-170.
- [6] 孙莉莉, 王其源. 城市居民社会保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有序 logistic-ISM 模型的实证分析[J]. 调研世界, 2019(4): 37-44.
- [7] 陈静, 柳颖.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工社会保障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江苏省 13 地市的实证调查[J]. 农村经济, 2018(4): 111-116.
- [8] 国家医疗保障局. 2023 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快报[EB/OL]. (2024-04-11)[2024-09-21]. https://www.nhsa.gov.cn/art/2024/4/11/art_7_12348.html.
- [9] 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 10.5 亿人[EB/OL]. (2023-01-22)[2024-10-16]. https://www.gov.cn/xinwen/2023-01/22/content_5738486.htm.
- [10] 汤兆云. 代际视角下农民工参加社会医疗保险的行为选择[J]. 社会科学家, 2021(1): 90-97.
- [11] 陆淑珍, 卢璐. “养”与“工”: 超龄农民工养老模式的探索性研究[J]. 南方人口, 2015, 30(6): 50-58.
- [12] 崔德刚, 邱芬, 邱服冰, 等. 基于 ICF 成年人休闲体育活动改善心理健康, 生活质量和福祉的系统综述[J]. 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 2021, 27(9): 1038-1047.
- [13] 王璞, 周晨, 任建明. 社会经济地位, 政治参与对民众反腐获得感的影响研究: 基于 CSS2017 的实证分析[J]. 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 2023, 12(2): 82-96.
- [14] 杨春江, 侯红旭, 姜文龙. 社会支持对农村老人生活满意的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河北省 19 个村的调查[J]. 农业经

- 济问题,2017,38(2):75-84.
- [15] 张文崢,张良文,方亚. 家庭代际关系模式与我国老年人抑郁症状的关系研究[J]. 医学与社会,2024,37(5):93-99.
- [16] 杨小娇,邢凤梅,汪凤兰,等. 社区老年人居家不出与孤独感、家庭关怀度的关系[J]. 中国老年学杂志,2019,39(9):2261-2264.
- [17] 卢文秀,吴方卫. 患寡亦患不均:双轨制基本养老保险与农民工过度劳动[J]. 中国农村经济,2023(7):100-123.
- [18] 仙蜜花. 第一代农民工养老保险权益损失及其补偿路径研究[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38(5):93-100.
- [19] 任亮亮. 建筑业超龄农民工养老模式的选择,实践意义与困境:兼论超龄农民工清退政策[J]. 人口与社会,2023,39(6):57-67.
- [20] 丁学娜,丁橙橙. 政府职业技能培训对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 人口与社会,2024:1-14.
- [21] 姚露萍,张伟.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现实困境与优化机制[J]. 教育学术月刊,2023(11):37-42.

附表 描述统计分析结果

类别	变量	人数/占比	均值/标准差	类别	变量	人数/占比	均值/标准差
个体因素	性别			社会保险因素	养老保险		
	男	407/53.8%	—		无	496/65.5%	—
	女	350/46.2%	—		有	261/34.5%	—
	年龄	—	58.19/5.646		医疗保险		
	受教育程度				无	282/37.3%	—
	未上学	114/15.1%	—		有	475/62.7%	—
	小学	280/37.0%	—		失业保险		
	初中	281/37.1%	—		无	737/97.0%	—
	高中	73/9.6%	—		有	23/3.0%	—
	中专及以上	9/1.2%	—		工伤保险		
	婚姻状况				无	724/95.6%	—
	无配偶	77/10.2%	—		有	33/4.4%	—
	有配偶	680/89.8%	—		生育保险		
家庭因素	工作状态			无	742/98.0%	—	
	无工作	358/47.3%	—	有	15/2.0%	—	
	有工作	399/52.7%	—	最低生活保障			
	家庭收支			无	710/93.8%	—	
	收小于支	347/45.8%	—	有	47/6.2%	—	
	收支相抵	286/37.8%	—	养老保障满意度	—	6.70/3.166	
社会生活因素	收大于支	124/16.4%	—	医疗保障满意度	—	6.51/2.958	
	家庭关系	—	8.89/1.892	就业保障满意度	—	5.73/3.180	
	家庭经济	—	5.72/2.683	最低生活保障满意度	—	5.94/3.347	
	社会经济地位	—	2.41/0.970	住房保障满意度	—	6.14/3.155	
	休闲娱乐活动	—	5.48/3.119	总体社会保障满意度	—	6.96/2.754	
	社交生活	—	6.72/2.858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ffecting Social Security Satisfaction among Older Migrant Workers: An Analysis Based on CSS 2021 Data

WANG Yan¹, LIU Chunpeng²

(1. Business School, Yancheng Teachers University, Yancheng, Jiangsu, 224007,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Yancheng Teachers University, Yancheng, Jiangsu, 224007, China)

Abstract: The proportion of older workers in the migrant working population has been increasing annually.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ffecting social security satisfaction among older migrant workers, such as pension security, medical security, employment security, minimum living guarantee, housing security, and overall social security satisfaction. It is based on the four types of factors: individual, family, social life, and social insurance, by using empirical analyzing methods. The research findings indicate that family economic status, leisure activities,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 are the core variables affecting social security satisfaction; followed by family income and expenditure status, family relationships, and social life; and then by medical insurance, minimum living guarantee, pension insurance, and work injury insurance. In addition, the higher the education level of older migrant workers, the lower their level of social security satisfaction. In the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weights of the individual satisfaction levels determining the overall social security satisfaction are, in declining order: housing security, pension security, employment security, medical security, and the minimum living guarantee. The level of overall social security satisfaction among older migrant workers is higher than those of individual security items, with employment security satisfaction being the lowest, making it a critical policy focus that requires urgent attention.

Key words: older migrant workers; pension security; medical security; employment security

〔责任编辑:陈济平〕